



GCS

Global Civilization Studies

GCS, Vol. 1, No. 1, 2026, pp.133-143.

Print ISSN: 3106-0978; Online ISSN: 3106-098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gc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gcs260110dbcgg>



龙舟文化出海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创新路径探讨

程露 (Cheng Lu)

摘要: 中国龙舟文化出海历史悠久,其中龙舟竞渡及端午节文化出海占据主流地位。龙舟竞渡不仅是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的民俗活动,更于20世纪80年代被定位为民族体育运动,其蕴含的积极进取、勇敢刚健的核心体育精神,是龙舟文化突破地域限制、实现全球传播的深层逻辑与内在动力。在海外传播的进程中,通过组织或参加国际性龙舟赛事,搭建跨文化交流平台,从打破族群隔阂与性别壁垒的全民参与,到文化交融的在地化改造,再到作为身心治愈手段的功能延伸,龙舟运动展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与包容性。新时代龙舟文化出海将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导向,在叙事创新、非遗传承以及治理经验共享等方面探索更多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文化出海; 龙舟竞渡; 治愈; 龙舟非遗

作者简介: 程露,文学博士,广州新华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广东文学与文化研究。电子邮箱: chenglu1996@126.com。

Title: Dragon Boat Culture Going Global: Innovative Paths for Cross-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Abstract: Chinese dragon boat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of overseas dissemination, with dragon boat racing and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culture taking center stage. Dragon boat racing is not only a folk activity combining competitiveness and entertainment value, but has also been designated as a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 in the 1980s. Its core spirit of positivity, courage, and resilience serves as the deep-seated logic and intrinsic driving force propelling dragon boat culture

Received: 15 January 2026 / Revised: 26 Mar 2026 / Accepted: 02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May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June 2026.

to transce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and achieve global dissemi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overseas dissemination, through organizing or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dragon boat competitions and building cross-cultural exchange platforms, dragon boat sports have demonstrated remarkable adaptability and inclusiveness. This is evident in how they break ethnic barriers and gender divisions through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foster localized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diversified roles, such as serving as a mean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ing.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dragon boat culture in the new era will be guided by deepening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exploring more practical approaches in narrative innova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the sharing of governance experiences.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Dragon boat racing; heal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Dragon Boat Racing

Author Biography: Cheng Lu, Ph.D. in Literary Studie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Guangzhou Xinhua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literary aesthetics, as well as Guangdong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chenglu1996@126.com.

一、引言

中国龙舟文化出海历史悠久。唐朝时日本遣唐使在长安学习大唐文化，龙舟竞渡作为当时唐代宫廷和民间重要节庆活动，亦被遣唐使所关注。1655年，日本长崎港的中国福建海船遭遇海浪溺死多人，为了超度亡灵当地举办龙舟竞渡活动，划龙舟此后成为长崎特色民俗。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的龙舟习俗大多受中国龙舟文化影响。唐宋、清末及民国时期是中国龙舟文化出海相对活跃的时期。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热度升温，海外举办龙舟赛事已蔚然成风。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5月30日）报道，端午节期间，第二届“红旗杯”法兰克福国际龙舟友谊赛（德国）、第三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南非）、首届“端午杯”中马龙舟友谊赛（马耳他）、2025“你好！中国”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塞尔维亚）、“侨乡中国‘结’”端午系列活动（西班牙）等世界各地龙舟纷纷开赛，可谓是古老文化的新生。据统计，已有逾80个国家及地区成为国际龙舟联合会（IDBF）会员，定期参加或举办龙舟国际赛，龙舟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当前学界关于龙舟文化出海的研究多囿于节庆活动的表层描述与动态报道，或者仅从民族体育运动等单一视角进行研究，而在龙舟传统制作工艺的保护传承、龙舟文化符号的深层解码以及社会功能的现代转型等维度的探讨尚显薄弱，更缺少系统性研究成果。因此，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探讨龙舟文化出海的历史经验、海外创新及未来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二、龙舟文化出海的历史实践

中国龙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主要包括：龙文化、龙舟祭祀文化、端午节文化、龙舟竞渡文化、屈原文化及其他有关龙舟竞渡起源的传说、龙舟制作工艺、龙船饭及龙舟民俗活动、龙船歌及其他龙舟文学，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龙舟竞渡、端午节文化等方面考察中国龙舟文化出海的实践与发展。

（一）龙舟文化的历史定位

今人秦秀强梳理中国古代龙舟文化经历的交通工具阶段、水上游戏阶段以及体育竞技阶段，他认为“‘龙舟竞渡’在整个龙舟文化史中，乃第三个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体育竞技活动时期的中心内容之一”（秦秀强，1991，p. 52）。龙舟竞渡从字面意思理解，意为划龙舟比赛。竞渡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活动，竞渡未必都是龙舟，扁舟、战船、皮划艇都可以竞渡，所以单纯的竞渡不能算作中国独有的传统文化。但是如果将竞渡严格限制为龙舟竞渡，也与中国竞渡的历史实践情况不符。龙舟作为竞渡工具始于何时何地尚未有定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不乏“龙舟”字眼，但是它们多是有龙饰的游玩之舟，不是竞渡之用。

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录了五月五日竞渡的民俗，隋朝杜公瞻注解说明五月五日是屈原投汨罗江的日子，楚人划船去救屈原，由此有了竞渡遗俗，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此外还提及竞渡习俗起于越王勾践，但语焉不详。梁人吴均撰写的《续齐谐记》也主张竞渡之俗源于楚人拯救屈原的过程，并据此阐释了端午节的粽子习俗。何培金等人研究中国各地各民族龙舟竞渡起源的种种神话与传说，包括纪念屈原、越王勾践、伍子胥、孝女曹娥、马援、张神、段赤诚、苗民保公、七个傣族姑娘，朝拜小龙王、唐王、宋王的恩赐等等，其中竞渡是为了纪念伟大诗人屈原这一传说流传最为广泛，从唐代起，纪念屈原成为端午节主流习俗。“龙舟竞渡曾是一种祭龙祭水神的宗教祭祀活动。……扎根于龙文化的基础之上，并由此衍生出纪念贤人、英雄的价值观念，具有一种全新的世俗文化色彩。”（何培金，1991，p. 109）可以说，在五月某特定日期竞渡同时伴有宗教祭祀或纪念屈原等活动才是中国独属的龙舟文化。

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是日，竞渡，竞采杂药”（宗懔，2018，pp. 44-47）。这是端午节由来之一，也是古代最早提及竞渡的文献，但是该文没有出现“龙舟”，也没有论及竞渡船只的形状或相关礼仪。历代诗文首次明确提及龙舟竞渡的是张建封的《竞渡歌》，诗中有云“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水面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何培金，1991，p. 72）。诗中所谓“两龙”即为龙舟，诗作者张建封时任岳州刺史，现场观看岳州、洞庭湖一带龙舟竞渡的激烈场景，有感而作。南宋陈元靓的《岁时广记》出现“端五”一说，其中“竞龙舟”（刘芮方，张杨激蓁等，2020，p. 223）篇引用了《荆楚岁时记》中有关竞渡缘由的两种说法，又援引大量唐诗描述龙舟竞渡的场景，可见端午节龙舟竞渡习俗在唐宋时期已发展较为成熟。2009年9月，湖北秭归、黄石，湖南汨罗以及江苏苏州四地联合申报的“端午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其中赛龙舟（含祭祀、竞渡、龙舟制作、仪式等）是核心习俗之一。对比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韩国江陵端午祭，后者完全没有龙舟竞渡习俗，江陵端午祭的核心习俗是萨满祭祀、假面舞、荡秋千、摔跤等等，无论是祭祀对象还是活动类型，都与中国端午习俗有明显差异。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五月端午前后都有祭祀民俗，但仪式与中国大不相同。有研究者指出“中国龙舟竞渡文化是中国龙文化、特别是中国龙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伦笃，1992，p. 12），中国端午节的官方译名为“The Dragon Boat Festival”（龙舟节）也就不难理解了。龙舟竞渡无论对于中国的龙舟文化还是端午节习俗，均是标识性的特征。

1985年在宜昌成立中国龙舟协会时，与会多方达成共识：“龙舟运动在我国源远流长，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特别是龙舟竞渡与纪念我国历史上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结合起来已成习俗，这就不仅使它富有民族性、群众性、竞技性、趣味性的特点，具有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魄的作用，而且还能有力地激发人们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何培金，1991，p. 129）”这一定位本身是相对全面的，指出了龙舟运动的体育性、民俗性、群众性、民族性、意识形态性等综合特征，但是由于核心定位是“传统体育活动”，加上全民健身的时代背景，龙舟的体育属性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二）端午龙舟的海外传播

中国龙舟文化出海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结合唐代遣唐使频繁往来及造船技术等东亚的传播路径，可以推断唐代的端午习俗、龙崇拜、赛龙舟等通过遣唐使、僧侣、移民等渠道已传播至日本及周边地区。成书于平安时代后期（时间相当于中国北宋时期）的日本小说《源氏物语》，其中诸多故事情节呼应大唐文化，比如小说中提及唐明皇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反复引用白居易的诗歌。小说第二十四帖《蝴蝶》描写了一种龙头鸂首的唐式游船，其内饰亦采用中国风格，三月暮春时节游船下水，船中有人奏乐，把舵操棹的童子穿着中国服饰，可见日本此时已有仿制大唐龙舟的活动。笔者从张伦笃的观点引申，认为龙舟文化出海的核心在于龙舟竞渡文化出海，而且常伴随着端午节的庆祝活动。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国东南沿海移民“下南洋”和赴美加务工，春节、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也流传至海外，华人华侨出于端午节庆、民俗祭祀以及凝聚宗乡情谊的需求，在海外华人社区内部举行龙舟竞渡活动。龙舟民俗在北美及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再次兴盛，并在当地华人社区生根发芽，形成了早期的海外龙舟生态圈。美国旧金山、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这些地区都是华人华侨聚集地，亦成为龙舟文化迁徙之地。不过，这一时期的龙舟竞渡，多为同乡华侨之间联谊，规模较小，但是生生不息，直至今日，海外庆祝端午节并开展龙舟竞渡仍是龙舟文化出海的重要形式，一般由同乡会、商会、中国大使馆等机构组织承办。

（三）龙舟竞渡的体育化国际化

根据《荆楚岁时记》《岁时广记》等文献推断，龙舟竞渡习俗大概形成于南北朝前后，隋唐时期已颇为繁荣，唐末五代发展至中国南方各地，规模可观。此后经中华各民族不断创新，时至今日龙舟竞渡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民俗活动之一。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记录了刘禹锡、欧阳修、苏轼等人描写龙舟竞渡的诗句，根据这些唐诗及地方志文献，可推测唐代已形成以夺标为胜的龙舟竞赛规则，且活动场面异常激烈，赛手奋勇拼搏、求胜心切，其行为亦与积极进取、勇敢刚健的现代体育精神相契合，这种全球共享的精神内核成为龙舟文化突破地域限制、实现全球传播的深层逻辑与内在动力。

20世纪70年代，以香港为中介的新一轮龙舟文化出海即以发展体育竞技运动为导向，探索现代意义上的国际龙舟竞技体系。1976年，香港旅游协会组织举办首届国际龙舟邀请

赛，虽然当时参赛国家不多，但是建立了国际龙舟运动赛事的雏形模式，此后逐年扩大影响，参赛国返回各地成立龙舟协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加拿大、意大利、丹麦等欧美国家也成立了龙舟协会。龙舟竞渡的规则也随之逐步走向标准化与国际化，为1991年国际龙舟联合会（IDBF）的成立及其统一竞赛规则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内龙舟竞渡的体育化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快速发展。1983年顺德龙舟队首次参加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获得冠军，1984年东莞、顺德两支队伍夺冠，引起世界关注。1984年国家体委将龙舟竞赛正式列入全国正式比赛项目，颁布《龙舟竞赛规则（试行草案）》，同年在广东佛山举办首届全国“屈原杯”暨广东省“丰收杯”龙舟赛。1985年，中国龙舟协会在湖北宜昌秭归成立，其发布的《中国龙舟协会章程》第二条指出：“中国龙舟协会是管理中国龙舟运动的全国群众性业余体育组织，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下属的工作机构”（杜达罗，2009，p. 59）。协会除了组织开展国内外龙舟比赛，负责制定、修改龙舟竞赛规则、龙舟裁判法、竞赛器材标准等工作，还“负责向有关部门提出外事活动的建议”（杜达罗，2009，p. 60）。龙舟运动不仅是比赛项目，也是全民健身的休闲体育项目，同时肩负推动中外文明交流的使命。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各地各民族龙舟造型和竞渡形式各不相同，也没有统一的器材、场地以及比赛规则，在中国龙舟协会成立之后，对于龙舟赛的形式、组别、类别、航道、场地设施、舟体、划桨、运动员、裁判员等各方面进行了规范。龙舟竞渡从祭祀仪式发展为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的民俗活动，又从节庆民俗活动发展为体育赛事，其标准化发展也为龙舟运动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1991年6月24日，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尼西亚、意大利、马来西亚、挪威、菲律宾、新加坡、英国和美国以及中国台北和香港等12个国家和地区组织成立国际龙舟联合会（英文缩写IDBF），总部设在香港（后迁至北京）。国际龙联是一个致力于龙舟运动的非政府、非营利性全球组织，主张保持这项运动的文化、历史和宗教传统；以及加强友谊纽带，将参与这项运动的人团结起来，并负责管理国际龙舟锦标赛及其认可的国际龙舟节，制定并执行国际龙舟锦标赛的竞赛规章制度。2010年广州亚运会（第16届亚运会），龙舟首次正式成为比赛项目，标志着这项传统民族体育运动实现制度化转型。2018年龙舟入选雅加达亚运会，2022年龙舟再度入选杭州亚运会。2021年东京奥运会和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龙舟亦作为表演项目亮相。2024年发布的新版《国际龙舟联合会章程及细则》也提出相应要求：获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认可，以及将赛龙舟发展成为一项奥林匹克运动。迄今已有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运动，龙舟竞赛成为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并且向高质量、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发展，其国际影响力还在进一步增长。

三、龙舟文化出海的创新实例

龙舟文化出海，不仅实现地理空间的跨越，还带来文化形态的增值。从打破族群隔阂与性别壁垒的全民参与，到因地制宜的在地化改造，再到作为身心疗愈手段的功能延伸，在海外传播的进程中，龙舟运动并未固守传统范式，而是展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与包容性。

本节选取三种较为典型的国外创新案例，揭示海外龙舟文化如何超越单一的体育符号，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

（一）族群与性别的突破

龙舟文化出海最初流行于华人社区或华侨群体，随着龙舟体育化国际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参加此项运动，龙舟活动早已突破族群限制，不仅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越来越多引入该项活动。比如南非 2000 年代初引入龙舟运动，加入国际龙舟联合会成员，成为非洲龙舟运动的先行者，开普敦经常举办全国性的龙舟锦标赛，其参与者不仅限于华人社区，很多南非本地白人、黑人以及混合族群都积极参与，是一项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运动。现场还设有中华文化互动区，民众可以品尝粽子、饺子等中国美食，体验书法、投壶等传统文化活动。阿根廷龙舟协会自 2019 年成立以来，定期举办龙舟赛（通常在中国春节及端午节期间），参加活动者不仅有当地华人华侨，还有大量阿根廷本地人、企业团队和学生，使其成为连接中阿文化的纽带。

中国传统龙舟活动有较多女性禁忌，比如禁止女性上船。随着龙舟运动的体育化国际化，女性禁忌基本打破。1985 年中国龙舟协会成立之初，其发布的竞赛规则就设置了女子组。2024 年 9 月 10 日生效的《国际龙舟联合会章程及细则》10.2 版“非歧视、性别平等”一节指出：(1)国际龙联反对以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性取向为由，对参与国际龙联活动的个人、群体、组织或国家进行任何形式和手段的歧视；(2)国际龙联应当在龙舟运动的各个方面促进和追求性别平等。这意味着龙舟运动体育化与全球先进文明保持同步。

龙舟运动的竞技性特征及其彰显的同心协力、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让这项传统体育运动超越民俗惯例而成为企业团建的热门项目，尤其受海外企事业单位青睐，海外商会常出资组建龙舟队，发展龙舟赛事。近年在意大利兴起的“中资企业协会杯”龙舟赛，意大利中国商会端午节龙舟赛以及各类意大利龙舟俱乐部赛事，即是典型代表，它们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竞赛，更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一心、奋斗进取的民族精神，同时作为向意大利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促进了中资企业同当地民众相互了解、加深友谊。

除此之外，海外龙舟运动还打破了时间限制，由于海外没有端午节假期或者因为南北半球气候差异，很多龙舟运动并不在端午节期间开展。例如日本长崎 1644 年首次赛龙舟活动并非端午节期间，而是取其纪念意义。澳大利亚的悉尼每年春节期间举办龙舟赛，并已发展为南半球最大规模的龙舟赛。一些欧美国家和地区将龙舟运动纳入企业团队建设、社区教育、学校体育等多元场景，其功能边界已从传统节庆仪式拓展为现代社会治理工具。

（二）海外龙舟的在地化

中国龙舟文化凭借体育属性走向世界舞台，其竞技元素获得较好发展，其次是节日习俗，但也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需求，进行了创造性的调整与融合，原有的祭祀文化、纪念文化被弱化，代之以更契合当地民众情感需求的本土文化或流行文化，具有明显的在地化倾向。加拿大温哥华龙舟赛即为典型案例，1986 年温哥华世博会，为响应温哥华市政府和社区的号召，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两位加拿大华裔青年突发奇想举办龙舟赛，后在温哥华中华文化发展中心与香港旅游局的协调下香港运送六套比赛用龙舟套装参

展，展会期间在世博会门口的福溪进行龙舟训练，并在该年6月开展首届温哥华龙舟节，自此点燃加拿大龙舟运动的火把。1989年，官方成立温哥华国际龙舟节社团，聘请专业团队进行运作和管理，同年举办首届温哥华国际龙舟节，2008年起更名温哥华力拓加铝国际龙舟节。加拿大是一个主张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龙舟节期间演出团队现场表演各种风格的音乐、舞蹈节目，现场摊位提供各种风味的食品与小吃，周边安排各种亲子活动项目以及划龙舟体验，每年因此吸引大批观众前来参加这一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会，龙舟节逐步从一项华人社区的传统活动，演变为展现温哥华多元文化、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平台。

“温哥华力拓加铝国际龙舟节就是华人文化和加拿大主流文化整合的成功案例。很多对华人文化不了解甚至有偏见的其它族裔的人，在龙舟节的多元文化熏陶中，能逐渐接受并喜爱中华文化”（王辉，2013，p. 51）。温哥华国际龙舟节是北美地区首个国际龙舟节，此后多伦多、纽约、蒙特利尔、洛杉矶等地相继举办龙舟节，这些龙舟节都表现为不同文化的融合。

龙舟运动期间开展经贸活动成为近年龙舟文化节常见形式。自古龙舟祭祀活动就有祈求龙神保佑、祈求丰收等主题，贵州清水江独木龙舟的龙头，至今仍采用“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字样。如今这一文化主题用于适应现代商业文化，借龙舟赛带动经济发展，实现不同商业文明的交流互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新并非简单的文化适应，而是通过“去语境化—再语境化”的符号重构，使龙舟文化在保持独特辨识度与生命力的同时实现全球文化在地化实践。它支持竞赛规则、管理模式的国际化，同时保留“同舟共济”的中国文化精神内核，进而转化为团队协作、公平竞争等全球共通的价值理念，实现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

（三）龙舟治愈功能的新发现

海外龙舟运动不仅仅是特定节日的民俗活动或专业赛事，而且成为具有广泛用途的健身项目，龙舟文化被赋予超越竞技与民俗的全新内涵，即一种强大的身心治愈力量。

20世纪90年代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开展“同舟并肩”（Abreast in a Boat）研究项目，用以挑战患乳腺癌的病人不能进行剧烈运动、尤其是不能进行上肢剧烈运动的传统观念，1996年，他们组织一批乳腺癌幸存者参加温哥华国际龙舟节获得良好反馈。意大利也有一支由乳腺癌患病经历妇女组成名为“粉红丝带”的龙舟队，这支特殊的龙舟队经常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欧尔湖等地进行龙舟训练和康复活动。龙舟运动不仅是生理康复的良方，更是心理重建的港湾，许多参加龙舟运动的乳腺癌者获得一种独特体验，如“缓解压力、收获友情、培养体育锻炼的兴趣、对健康生活的重新认识、增强了生活的自信心和满足感等积极心理体验”（毛书凯，2021，p. 36）。龙舟的鼓点节奏与团队协作，将个体与个体紧密相连，形成强大的心理支撑。

纪录片《我们不能看着你打败我们·温哥华龙舟节》（We Can't See You Beating Us）讲述了加拿大温哥华“龙之眼龙舟队”的事迹，其成员均为视力障碍或全盲人士，他们克服生理上的巨大挑战，不依赖视觉，而是凭借听觉（鼓点节奏）、触觉（水流与船身震动）

和团队合作，共同学习、训练并参与激烈的龙舟竞赛。纪录片并没有花太多篇幅讲述其训练的经过，更多的讲述每个人的生活，表现他们的独立性以及对一种正常社交生活的渴望。盲人参加龙舟运动，不是为了治疗身体疾病，也不仅仅因为体育竞技，更是为了打破障碍、融入社会，重塑生命价值。这是一个关于勇气、信任与自我超越的动人故事，强调信心、信任、合作等具有心理疗愈作用的精神力量，它赋予龙舟文化新的内涵：治愈与重生。

四、当代龙舟文化出海的新发展

作为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体育文化符号，龙舟运动通过制度化、标准化与在地化的创新实践，不仅在国际体育场域中确立了独特的文化身份，更通过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反哺机制，形成了“输出一重构一反哺”的动态循环体系，丰富的出海实践不仅拓展了龙舟运动的功能维度，更通过文化传播的回流机制影响了国内对龙舟文化价值的再认知。时至今日，文化出海不仅是华侨的自发行为，而且得到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龙舟文化出海迎来新的发展前景。

（一）龙舟文化数字出海

学术界提出文化数字出海“新三样”，即网文、网剧、网游，龙舟文化数字出海亦大有文章可作，但是当前龙舟主题的文网、网剧、网游尚未出现代表性作品。相比而言，以龙舟竞渡为主要叙事题材的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不仅成为文旅市场重要的引流手段，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官媒还是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龙舟竞渡短视频的叙事逻辑仍然强调其竞技性，以及同心协力、奋勇争先的团队精神，未突破常规主题，“团结、奋进、爱国”的中国龙舟精神如今已成为共识（何培金，1991，p.130）。部分视频拍摄与龙舟竞渡相关的文化活动，如龙舟祭祀、说唱文学等，但是其主题创新及叙事形式未产生明显的有别于传统的社会效应。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短视频的配乐极具国际化特征，一些欧美、日韩、印度等国的流行音乐搭配中国龙舟赛画面，极富感染力。例如佛山叠滘龙舟漂移大赛冠军队冲刺、祝贺的画面，配乐是皇后乐队的 *We Are The Champions*，还有印度电影《巴霍巴利王》的插曲亦常用于各类龙舟赛视频，这些文化杂糅大多出自网友的无心之举，但客观上也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传统文化倡导的龙舟精神如何适应当代叙事语境成为重述龙舟故事的关键，叙事还要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性与实现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关系。从意识形态角度而言，在中外文明交流过程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意味着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此，讲好龙舟故事仍有较大叙事空间。

（二）龙舟文化相关非遗出海

中国龙舟文化的发展，始终与端午节习俗同频共振，共同构成端午节文化。《荆楚岁时记》记录的五月五日习俗除了竞渡，另有采杂药、系五彩丝等。《岁时广记》记录了送鼓扇、买桃艾、裹黏米、菖华酒、五彩丝、长命缕、掺艾虎、浴兰汤、贴茶字等 70 余种发生于五月初五的习俗。自古以来，端午节期间与龙舟竞渡并行不悖的民俗活动丰富多样。湖北秭归每年都有隆重的端午祭祀礼仪，贵州清水江独木龙舟相关活动有五十余种，珠三

角地区赛龙舟有龙船歌热场、吃龙船饭、龙船景，广西桂林旧时龙舟游乡也有大量对歌活动，从端午节延续至六月六。这些自古传承的龙舟传统活动常被纳入非遗行列，它们深深根植于世俗化民间社会，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当代端午文化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管理的需要，被简约化为赛龙舟和吃粽子。旧时龙舟下水、收水等祭祀仪式融合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屈原文学等中华传统文化，但是有些仪式因有封建迷信之嫌而被简化甚至取消，上文提及的许多端午节习俗今日已经不复存在，龙舟竞渡的体育竞技性不断被强化，地方小事件发展为体育大事件，却也将乡土大事件变成政府小事件，它“剥离了民间的叙事空间与乡土情怀，呈现出与民俗渐行渐远的形式化走向”（罗湘林、刘亚云、谢玉，2015，p. 81）。上世纪90年代龙舟运动体育化国际化过程中，更新旧的龙舟文化观念无疑是进步的，如今新时代龙舟文化则需还原其丰富多样的本来面貌，充分释放端午文化活力以满足人们不同的文化需求，龙舟文化所包含的饮食文化（粽子、龙船饭、团子）、药文化（艾草按摩、治未病、美容等药用）、游戏文化（斗草、走马、射柳、舞狮）、服饰文化（装扮女儿、汉服体验）、音乐文化（龙船歌、对歌）等需进一步拓展其文化内涵，并依托端午节庆、龙舟运动走向更广阔的国际空间，尤其是其中一些项目已被纳入国家各级非遗名录，成为非遗保护对象，它们既是中国人民喜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通过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被世界人民共享。

（三）中国治理经验出海

龙舟竞渡历史悠久，而且组织严密，其最初的组织者为氏族、宗族、祠堂、自然村赛等，近代为街道、州、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城镇化基层单位变化，生产队（村）、乡、镇、县转变为街道、社区、县、市、省等等，龙舟竞赛组织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如今，参与龙舟组织管理的人通常都是当地主流政治体制的公务人员或乡贤，一般由政府领导人牵头成立领导小组，同时联合市场、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下设若干工作组安排具体事务，形成政社企合作的治理新格局。在海外，龙舟活动多由当地孔子学院、中资企业商会、中国大使馆等官方机构或公司组织，龙舟出海具有鲜明的国家主导型特征，政府部门通过制定文化交流政策、组织文化交流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推动传统文化走向世界。龙舟竞渡的组织演变，反映了传统民俗资源如何不断适应并嵌入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政治经济结构的过程，这也为龙舟文化出海的意识形态功能找到了历史依据。

新时代以来，长三角、珠三角一带的龙舟活动呈现出欣欣向荣面貌。地方政府通过举办龙舟赛事，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以及龙舟文创等产业的繁荣。而且，随着国家乡村建设、“百千万”工程、非遗保护等各项治理政策的推进，龙舟活动在社会治理方面亦发挥明显成效。广东东莞为了发展龙舟运动，推动特色精品示范村建设，结合水乡龙舟传统文化，打造乡村宜居环境。广东佛山将传统的村居河道改造成现代龙舟赛道，日常乡土空间转化为旅游生态空间，政工商民共建共治共享，既保留众多传统宗祠祭祀仪式与民间习俗，又有现代短视频、现场直播带来的现象级效应。彭莹等研究者指出“广佛龙舟通过仪式展演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柔性策略……赛龙舟的仪式展演在国家文化实践与文化自信的话语中有了更丰富的呈现”（彭莹等，2025，p. 140）。龙舟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也是社会

治理的工具。广东赛龙舟文化的传承不断提质升级，一是善于发挥基层创造力，实现保护制度上的创新。二是引入社会资本，形成政府引导、群众为主体、企业和协会共同参与做大做强的模式。三是增强社区和村民之间的凝聚力，推动村民自治发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将龙舟体育运动的特质与传统乡土文化融合，形成软性的文化约束并强化价值观，以文化人。上述来自于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治理经验，也应成为龙舟文化出海的一部分。

五、结语

当前国内关于龙舟文化出海的研究刚刚起步，本文通过追溯龙舟文化出海的历史实践，梳理龙舟竞渡的节日属性及体育属性在国际传播中主导作用，论述海外龙舟运动的创新发展及在地化，尤其是“同舟共济”的身体实践所带来的心理治愈成效，并以此观照当代龙舟文化出海新动向，指出龙舟文化数字出海、非遗出海、中国治理经验出海等可行性方向。龙舟文化出海不是中华文明的单向度输出，而是全球文明对话，通过吸收国际经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创造性融合。从理论层面而言，龙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实践为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它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预设，展现出文化流动的多向性与创造性。这种“输出—重构—反哺”的循环机制，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揭示了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地方性经验与全球性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更在全球化语境下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当龙舟竞渡的鼓声在六大洲的水域响起时，它传递的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更是人类对“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同追求。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教育厅2024年度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粤港澳当代小说传承岭南非遗文化的叙事模式研究”（编号：2024WTSCX074）阶段性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Cheng Lu^{1D} <https://orcid.org/0009-0008-2461-5647>

References:

- 杜达罗（2009）：《龙舟》，广东科技出版社。
[Du Daluo (2009). *Dragon Boat*,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何培金（1991）：《中国龙舟文化》，三环出版社。
[He Peijin (1991). *China Dragon Boat Culture*, Sanhuan Publishing House.]
- 刘芮方，张杨激蓁等点校（2020）：《岁时广记：外六种》，浙江大学出版社。
[Liu Ruifang, Zhang Yangweizhen, et al. (2020). *An Overview of Chinese Conventional Festivals: Six Additional Works*.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罗湘林,刘亚云,谢玉(2015):“从故事到赛事——汨罗龙舟竞渡的底层视角”,《体育与科学》(1): 81-85。[DOI:10.13598/j.issn1004-4590.2015.01.013]

[Luo, X., Liu, Y., & Xie, Y. (2015). “From stories to events: A grassroots perspective on Miluo dragon boat racing”. *Sports & Science* (1):81-85.]

毛书凯等(2021):“乳腺癌龙舟运动发展研究”,《福建体育科技》(5): 34-37。

[Mao,Shukai., et al. (2021).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dragon boat sport for breast cancer”. *Fujian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34-37.]

彭莹,邝若梅(2025):“广佛龙舟参与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向研究”,《文化遗产》(6): 138-146。

[Peng, Y., & Kuang, R. (2025). “A study o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Guangzhou-Foshan dragon boat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governance”. *Cultural Heritage* (6) : 138-146.]

秦秀强(1991):“我国龙舟文化史钩沉”,《学术论坛》(1): 52-57。[DOI: 10.16524/j.45-1002.1991.01.011]

[Qin,Xiuqiang (1991).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dragon boat culture in China”. *Academic Forum* (1):52-57.]

王辉(2014):“加拿大华人文化和主流文化整合的案例分析——以温哥华力拓加铝国际龙舟节为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02): 74-81。[DOI: 10.13835/b.eayn.15.11]

[Wang, Hui (2014). “A case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ainstream culture in Canada: Taking the Vancouver Rio Tinto Alcan International Dragon Boat Festival as an example”. *Southwest China Borderland Ethnography* (2):74-81.]

张伦笃(1992):“我国竞渡运动发展的三个阶段”,《云梦学刊》(2): 10-12。

[Zhang, Lundu(1992).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ragon boat racing in China”. *Journal of Yunmeng*(2):10-12.]

[梁]宗懔(2018):《荆楚岁时记》,杜公瞻注,姜彦稚辑校。中华书局。

[Zong, Lin (2018). *Jingchu Suishiji*. Zhonghua Book Company.]